

甲申易枢前李鸿章与张佩纶 关于越南问题的研判^{*}

高 航

【摘 要】在甲申易枢前，分属洋务派和清流派的李鸿章与张佩纶对彼时中法两国争执的焦点——越南问题多有函商。张佩纶对越南问题的最初认知便源自李鸿章，但缘于立场与观念的差异，二人的对越策略很快便出现了分歧：李主和，张主战。在对前线将领的评价等方面，二人也发生齟齬。尽管如此，李、张仍不乏共谋，张佩纶在入职总理衙门后欲与李鸿章“内外并力”，共挽时局。在北宁兵败后，形势急转直下，张佩纶秉持清流与洋务两脉“各有门面”的观念，谢绝李鸿章邀其参与中法议和以作退路的好意。李鸿章与张佩纶在甲申易枢前关于越南问题的意见分歧，基本也映射了其最终的命运归宿。

【关键词】李鸿章 张佩纶 越南 中法战争

【作者简介】高航，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讲师。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 - 1125 (2024) 09 - 0126 - 14

熟谙清季政事秘辛的惜阴老人赵凤昌晚年忆往，曾撰《光绪甲申朝局之变更》一文专述甲申易枢，称其乃“同光清流于朝局盛衰之关键，清流亦自此结局……其时南皮知之最稔，谆谆见告，谓年辈晚者，应知当时朝局变更之所自，后来世变之有因也”。^①此文后经黄潜推扬而广为人知，^②甲申易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近代中日商约与双边经贸关系研究（1871—1931）”（20CZS055）、2024年度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项目（GZC20240580）的阶段性成果。

① 惜阴：《惜阴堂笔记二则·光绪甲申朝局之变更》，《人文月刊》第2卷第5期，1931年6月，第1~2页。

② 参见黄潜著，李吉奎整理：《同光间南北派系》，《花随人圣庵摭忆（上）》，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18~523页。

枢亦被视作晚清时局崩坏之开端。^①近年来随着各色史料的大量涌现，甲申易枢的基本事实已大体明了。^②唯此变与中法战争相表里，同时牵涉清流、淮系等多方恩怨，而清流、洋务两脉势力的升降，又关系着光绪前期朝局内外权势的变动与消涨，故探讨清流代表张佩纶与洋务巨擘李鸿章在中法战争前的“越事”策略极为重要。

邵循正的《中法越南关系始末》和龙章的《越南与中法战争》为后来人研究中法战争奠定了坚实基础，两书对李鸿章与法方代表宝海、脱利古、福禄诺的历次和谈均描述甚详。^③王维江质疑了传统的南北之争，指出张佩纶穿梭于李鸿藻和李鸿章之间，为二李积极谋划。^④姜鸣进一步探讨了张佩纶与李鸿章、李鸿藻及清流内部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展示出光绪朝前期政局的复杂图景。^⑤戴海斌以李鸿章与张之洞二人的早期交往为主线，深入探讨了洋务派与清流派之间的复杂关系。^⑥张晓川对甲申易枢后张佩纶致李鸿章的一封密函进行了详尽的笺释，厘清了诸多疑题。^⑦

虽然各位学者对中法战争时期的李鸿章与张佩纶不乏研究，但对两人在甲申易枢前关于越南问题的认知、讨论与谋划缺乏较为系统的梳理，故笔者不揣浅陋，拟以李、张之间的往来信函为主体史料，详人所略地解读李、张关于越南问题的研判，以期推动中法战争和光绪朝政局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① 张謇在自订年谱中称由甲申易枢“而有甲午朝局之变，由甲午而有戊戌朝局之变……故谈朝局国变者，谓始于甲申也”，见张謇：《啬翁自订年谱》，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编委会编：《张謇全集》第8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3页。

② 目前关于甲申易枢最全面的梳理，参见姜鸣：《邯郸一枕笑匆匆：“甲申易枢”与政局大变》，《却将谈笑洗苍凉：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编》，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124~184页。

③ 参见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龙章：《越南与中法战争》，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中法战争研究的相关成果较多，参见葛夫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法战争史研究》，《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第111~127页。

④ 参见王维江：《张佩纶：悲情“清流”》，《史林》2008年第5期，第1~13页。

⑤ 参见姜鸣：《李鸿章“夺情”复出与“清流”的幕后筹划——张佩纶李鸿章通信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14~22页；姜鸣：《尺牍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1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71~497页；姜鸣：《张佩纶的交游和政治生涯》，《文汇报》2017年2月17日；姜鸣：《张佩纶与李鸿章的关系》，《文汇报》2017年2月17日；姜鸣：《张佩纶、李鸿藻以及“清流”的转折》，《文汇报》2017年2月17日；姜鸣：《张佩纶是如何与张之洞断交的》，《文汇报》2017年2月17日；姜鸣：《竹林酒熟忆朋欢》，《文汇报》2017年2月17日。

⑥ 参见戴海斌：《清流、洋务“各有门面”？——以李鸿章与张之洞早期交往为线索》，《史林》2021年第1期，第111~128页。

⑦ 参见张晓川：《张佩纶致李鸿章密札隐语笺释》，《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1期，第117~125页。

一、“越南之衅将兴”：越事初起时的李、张认知

光绪七年（1881年）闰七月，完成了中俄修约谈判的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回到巴黎，开始准备就越南问题与法方进行正式交涉，他一面会晤法国外长，一面致电总理衙门，劝清廷早做准备。^① 总理衙门于十月十五日上陈奏折，称越南积弱已久，如放任法国占领越南，则后患无穷，并称李鸿章曾建议招商局轮船与兵轮同往越南，以壮声威。^② 上谕遂令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张树声等疆吏会同办理。^③ 越南事务自此开始进入京师君臣的视野，并逐渐成为朝政的重要议题。

十月二十一日，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在天津会见由沪赴京的法国驻华公使宝海，宝海称法国绝无吞并越南之意。^④ 十一月十五日，时任翰林院侍讲的张佩纶致函李鸿章，讯及越事，请李鸿章将“法越所立条约及劫侯（曾纪泽）节次来函摘要示知”。^⑤ 李鸿章与张佩纶之父张印塘因共同参与镇压太平军的作战建立起交谊，张佩纶作为故人之子，在同治末年即已与李鸿章建立联系。^⑥ 从光绪四年开始，二人书信几乎往来不辍，多言及朝政举措、时局秘辛及彼此政略。^⑦

十一月十七日，张佩纶再次向李鸿章去函商讨厘税与海防，“琉球之案未结，越南之衅将兴”，函末催促李鸿章，“越南之事乞详复”。^⑧ 十一月二十四日夜，李鸿章回函张佩纶：

越南衰弱太甚，乃甘心听命于法，名虽朝贡，而其立约始末，并无一语报知，总由朝廷专尚虚饰，礼部、总署各循例当差，不相通会，听客所为……是云南通商，越已代许之，亦不一诘责。内意恐一诘问而越

① 参见李恩涵：《外交家曾纪泽》，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166~175页。

② 参见《总署奏接曾纪泽电法人谋越通滇拟预筹办法折》，王彦威、王亮辑编：《清季外交史料》第2册，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06页。

③ 参见《总署奏越南积弱已甚中国为藩篱计不能置之度外片（附上谕）》，王彦威、王亮辑编：《清季外交史料》第2册，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07页。

④ 参见《附 法国宝使来署问答节略（光绪七年十月二十一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3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8~89页。

⑤ 《张佩纶致李鸿章（光绪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姜鸣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77页。引文中括注的文字系笔者所添，下同。

⑥ 参见姜鸣：《李鸿章“夺情”复出与“清流”的幕后筹划——张佩纶李鸿章通信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14~15页。

⑦ 参见姜鸣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⑧ 参见《张佩纶致李鸿章（光绪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姜鸣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79~180页。

人输情于法，或转求助于我，无以应之，亦可怜已。昨法使过津，鸿章详询，据称该国实无并吞之志，亦无阻其朝贡之心……滇与粤西疆吏得人似犹可为补救之计。^①

由此可见越事初起时李鸿章以及清廷的越南策略之基调，后来李氏的对法态度亦多可从中窥见端倪。李鸿章认为中越名为宗藩关系，实则越南已听命于法，清廷的涉外机构因循滞碍，难辞其咎。越南对法条约的个别条款基本相当于代许云南通商，但纵然如此，朝廷亦未诘责越方，或是恐越南彻底倒向法国，抑或是恐越南向中方求救，而清廷又无力助越南彻底摆脱法国侵占。清廷高层对越南的此种不收不拒的矛盾心态，亦意味着从一开始越南便已是中方的“盘中弃子”，清廷真正关心的只是宗藩体制的虚名与西南边境的稳定。李鸿章仅凭宝海数语便判定法国一时不至占据越南，不单单是盲目乐观，主要在于当时中俄、中日、中英之间纠纷乃至朝鲜问题纷至沓来，令疆臣大吏应接不暇，作为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不堪其扰，自不愿中法之间再起新衅，唯有寄希望于“滇与粤西疆吏得人”，以为补救之计。

张佩纶阅后释然，复函称“知法、越尚可从容布置”，此后若两广总督张树声探得情报，亦请一并告知。^②可见此时张佩纶以李鸿章所见为的论，亦寄希望于西南督抚。然而，吊诡的是，正是张佩纶本人后来举荐的西南疆吏兵败涂地，为清流派的败亡埋下了伏笔。

光绪八年正月初八日，张佩纶上《保小捍边当谋自强折》，是疏针对中日琉球问题、中法越南问题提出应对之策，其根本在于兴水师、固海防。^③四月初十日，他又与陈宝琛联衔合上《存越固边宜筹远略折》，建议以李鸿章或左宗棠南下督师，防守法人，并举荐“用兵迅悍”的滇桂藩司徐延旭、唐炯二人。^④李、左虽皆未南下，但徐、唐倒是均被朝廷重用，后来又先后被拔擢为广西巡抚、云南巡抚。徐、唐两人都是张之洞的亲戚，^⑤与清流派关系紧密，被认为是知兵治军之才。

光绪八年三月初，李鸿章因母故丁忧，张佩纶积极谋划使李鸿章夺情复

① 《致张佩纶（光绪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夜）》，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3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97页。

② 参见《张佩纶致李鸿章（光绪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姜鸣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84页。

③ 参见张佩纶：《保小捍边当谋自强折（光绪八年正月初八日）》，石向骞等点校：《涧于集》上册，燕山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47~454页。

④ 参见张佩纶：《存越固边宜筹远略折（光绪八年四月初十日）》，石向骞等点校：《涧于集》上册，燕山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59~464页。

⑤ 参见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第1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504页。

出。同年，朝鲜发生壬午之变，为李鸿章重新出山创造了契机。李鸿章在籍期间又发生了张树声奏调张佩纶帮办一事，使张树声、张华奎父子与张佩纶结下私怨，成为日后甲申易枢的潜因。^①

二、“法已视越为囊中物”：两次和议期间李、张的策略差异

光绪八年十月十六日，法国驻华公使宝海来津，提出“越事办法”，自此开始李鸿章与法方的第一轮会谈。虽然双方一度达成一致，但因法国方面内阁改组，新任内阁对李宝协议大为不满，故宝海被迫辞职离华，是为“中法首次妥协之失败”。^② 在李宝会谈期间，张佩纶与李鸿章频繁函商越南问题。十一月二十二日，张佩纶致函李鸿章，认为与法议约越南仍须倚重李，但天津距西南太远，仅凭曾国荃、岑毓英等西南疆臣难成此事，遣员出关又恐为法人所惑，李鸿章既已夺情复出，便应全力以赴，襄成此举。在朝堂之上，虽然人多主战，但终是虚声。^③ 十二月初四日，张佩纶又向李鸿章抱怨总理衙门乏人，希望可以内召张之洞回京入职署。^④

李鸿章则建议张佩纶去劝军机大臣李鸿藻“多赴译署”，毕竟恭亲王奕訢尚在病假之中，李鸿藻暗中主持总理衙门，正值与法人交涉之时，“与外人议事不及内政之可以主断”。此前总理衙门已通过了《李宝节略》，拟于来年春天在越南与法方谈判具体细节，但因法使不肯往越，李鸿章深感自己徒负和戎之名，越事依然难办。^⑤ 十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又向张佩纶陈述了自己对接下来中法议约的全盘看法，“法已视越为囊中物”，清廷出面也只能保持北圻不被侵吞，但接下来便存在界务、商务两大难题，同时如何处理

① 参见姜鸣：《李鸿章“夺情”复出与“清流”的幕后筹划——张佩纶李鸿章通信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18~19页。

② 参见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9~97页；龙章：《越南与中法战争》，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3~127页。此外，日本学者冈本隆司还从协议的字面文本入手，分析中法双方的利害关系和潜在矛盾，认为《李宝节略》遭到否认是迟早之事，参见〔日〕冈本隆司：《属国与保护之间：以1880年代初期的清法越南交涉为中心》，《政治大学历史学报》（台北）第33期，2010年5月，第83~111页。

③ 参见《张佩纶致李鸿章（光绪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姜鸣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67页。

④ 参见《张佩纶致李鸿章（光绪八年十二月初四日）》，姜鸣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69页。

⑤ 参见《致张佩纶（光绪八年十二月初七日夜）》，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3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99~200页。

在越抗法的刘永福亦极为关键。^①

张佩纶回函未见，但从李鸿章的下一封复信可以判断，张佩纶认为法军无力击败刘永福，还提出中法在北圻南北分治之说。关于前者，李驳斥其“视刘永福太重，而量法太轻”；至于后者，李认为西南的饷力、兵力难以长期支持，分界和通商均须参酌大局方可定义，由“滇、粤自行酌定”，不能仅凭意气。李鸿章还提及“去冬法廷正议大举，宝使恐与中国生衅，从旁调停，故鄙人迎其机而导之”，^② 看似推重宝海，实则自矜事功，但现实很快使其和议的计划破产。

光绪九年正月，新任法国内阁将宝海撤职，并废止前议，越南局势陡变。张佩纶探知消息，“闻巴黎政府易人，宝海之说，谅不果行”，^③ “法越之议，闻已中改”。^④ 二月十九日，张佩纶向在夺情后再次返籍的李鸿章去函，称越南之事“恐非兵力不办，望勿游移”。^⑤ 从字面上看，张佩纶力主出兵越南，以武力定胜负。在数日前，他也曾奏请朝廷令徐延旭出关布防，经划北圻。^⑥

二月十五日，上谕令徐延旭出关拒敌。^⑦ 三月初，张佩纶又向李鸿章言道：“越南事竟无布置，鄙见此当委重粤西，疏请徐晓山（徐延旭）出关，已蒙俞允。彼此皆虚张声势，及其就范，公乃导以和局，或易为才。”^⑧ 可见，张佩纶的两手谋划意在奇正相辅、以战佐和，明为遣徐布防，实则欲为李鸿章下次和议增加砝码。

此时在合肥老家守制的李鸿章声称不愿再承重担，“不才五五垓庐中，断无再握疆符之理”。^⑨ 然而，形势比人强，三月二十五日，清廷又以越事

① 参见《复张篢斋署副宪（光绪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3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3~204页。

② 参见《复张篢斋署副宪（光绪九年正月初七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3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11页。

③ 《张佩纶致李鸿章（光绪九年正月二十一日）》，姜鸣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80页。

④ 《张佩纶致李鸿章（光绪九年二月初二日）》，姜鸣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82页。

⑤ 《张佩纶致李鸿章（光绪九年二月十九日）》，姜鸣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86页。

⑥ 参见张佩纶：《越事趋重粤西请简边材折（光绪九年二月十三日）》，石向骞等点校：《涧于集》上册，燕山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13~515页。

⑦ 参见《清德宗实录》卷160，光绪九年二月乙丑，《清实录》第54册，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242页。

⑧ 《张佩纶致李鸿章（光绪九年三月初五日）》，姜鸣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87页。

⑨ 《致张佩纶（光绪九年三月十八日夜）》，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3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页。

紧急为由，下诏强起李鸿章，令其前往广东节制两广与云南三省军事，李请暂往上海，遂于四月二十二日抵沪。^①五月初二日，新任法使脱利古来沪，随后开始李脱谈判，但因双方意见不合，脱利古坚不承认中越的宗藩关系，故谈判很快归于失败。^②

五月十六日，清廷催促李鸿章回津署理北洋大臣。^③五月二十日，李鸿章向张佩纶寄一长函，在信中大倒苦水，怨念颇深，对中枢决策极为不满。他认为，朝廷向来不问越事，在仓促之际才委以重任，甚至令其南下统兵，麾下淮部虽有两万兵马，但难以抽调，是有以“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之讽。然若以左宗棠南下，则更为不妥，边事选将极难。^④因为李、左镇边最早出自张佩纶之议，而时下的枢廷决策多半又受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影响，所以李鸿章此函难免也暗含责备张佩纶之意。张佩纶在接书后深感不悦，遂回信批驳：一则称其过往所上奏疏虽未能洞察先机，但李作为海内名臣，于承平之时并无经营西南之策，直到越南事起方才自我辩解、诿过他人，去岁在与宝海和谈时更有“怯敌”表现；再则强调其从陕西回京后，首先便上折请李鸿章回镇北洋，对李寄托期望，而李鸿章竟对此不察，一味抱怨枢廷浅谋、言路参劾，向自己宣泄不满。张佩纶自觉出于公私友朋之义，处处为李谋划，反而被李苛责，故在函中直陈不满，语气更为直率，但也可见两人交谊非比寻常。^⑤

李鸿章大为触动，在复函中语有愧疚之意，称张佩纶“无愧诤友”，但同时亦为自己辩白，表示张所言“徇宝海之游辞，弛三边之戍守”绝非事实——唐炯在宝海来津前业已退军，而粤西防军并未撤退。函中还对张佩纶列举的边防人才逐一加以点评，认为张之洞、刘秉璋独当一面尚可，但恐难于共事；徐延旭没有军事历练，远不如潘鼎新，后者知兵善战，“海内文员无出其右”。^⑥

张佩纶对法持审慎态度，认为法方虚声恫喝，劝李鸿章力持正论、筹备边防。对徐延旭、潘鼎新两人的评价，张与李恰恰相反：他坚称徐延旭“习于边事，历练当可成材”，却以潘鼎新为“偏裨才，难以独当一面，内多欲

① 参见刘忆江：《李鸿章年谱长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94页。

② 参见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7~105页；龙章：《越南与中法战争》，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7~149页。

③ 参见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11页。

④ 参见《复张篋斋署副宪（光绪九年五月二十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3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33页。

⑤ 参见《张佩纶致李鸿章（光绪九年六月初四日）》，姜鸣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96~298页。

⑥ 参见《致张佩纶（光绪九年六月初八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3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38页。

交接枢廷，沾染嗜好。而外无威，言语草率，举止粗简”，认为李对潘有旧部私情，难以公正。^①

李鸿章则指出，当前议战、议和皆为空言。至于张佩纶对潘鼎新的偏见，李鸿章颇觉诧异，称潘鼎新不但毫无嗜好，而且未结交枢廷内臣，仅是寡言不合群，但“临事坚忍机变”。^② 后来中法战争的事实证明，潘鼎新的统兵之才确实远胜徐延旭。

三、“内外并力”：张佩纶入职总署前后与李鸿章的筹谋

光绪九年七月初四日，张佩纶从总理衙门大臣陈兰彬处听闻越南国王身患重病，深以为忧，清廷之力如不足取越，则越定被法占，势必后患无穷。^③ 实际上，越王阮福时已于半月前去世，李鸿章早知此事，并表示自己正在通过美使杨约翰与法方斡旋，若“刘永福果能严守，使彼屡扑不动”，则利于中法和议，而此时中国军队不宜与法军正面冲突，因为无论胜负，都必然使争议再起。^④ 张佩纶又向李鸿章询及法人秋深进攻之说是否属实，李认为极有可能，但他最为忧心的则是能否守住北宁，若守不住，一来损兵折将，二来和局更加难开。^⑤

七月十七日，法将孤拔占领越南都城顺化。七月二十三日，法越签订《顺化和约》，越南自承为法国保护国，并驱逐刘永福的黑旗军出境。^⑥ 李鸿章将条约全文寄予张佩纶，称中国绝不能承认此约，但法方若不撤军，此后“口舌甚长”。^⑦ 十月十三日，李再将前线军情寄张：法方加紧进军，准备增兵进攻山西（今越南河内直辖市下辖的山西省）、北宁，徐延旭前线抱病，西南防务颇为棘手；而法国本土政府已与曾纪泽停止谈判，张树声请旨出关

① 参见《张佩纶致李鸿章（光绪九年六月十七日）》，姜鸣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01~302页。

② 参见《致张佩纶（光绪九年六月二十一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3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40页。

③ 参见《张佩纶致李鸿章（光绪九年七月初四日）》，姜鸣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06页。

④ 参见《致张佩纶（光绪九年七月初十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3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45页。

⑤ 参见《致张佩纶（光绪九年七月十九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3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48页。

⑥ 参见李宗侗、刘凤翰：《李鸿藻年谱》，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05页。

⑦ 参见《致张佩纶（光绪九年八月初四日夜）》，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3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55页。

未获允准；北洋方面又恐法舰北上，遂遣吴大澂驻防津滦。^①

张佩纶仍希望李鸿章可以出镇西南，“前敌若选将简器，厚集其势，犹可有为”，并请李将前线各路探报奏疏全部“密录一分见示”。^②在数日后，张佩纶再去一函，敦请李鸿章除了“近防北海”，尤须远顾北圻，切勿坐观成败。^③

光绪九年十月底，越南发生政变，主战派另立新王，否认《顺化条约》。十一月初，上谕令张佩纶入职总理衙门。^④李鸿章闻讯寄函，再论越事，言张树声欲请彭玉麟出关督战，但恐彭难敌法，岑毓英亦请率军出关。李鸿章认为，时下应该镇定严守，以待转机，不可贸然进军，万一攻河内不下，徒增口实；北洋军队“地广力单”，只能自守门户，无力远顾北圻；“法议院尚不愿遽与中国失和”，虽增兵进攻山西、北宁等地，但“似其上下已有成见”。^⑤李鸿章的对法判断再次失误，仅四日后，法国国会便通过了增筹北圻军费及内阁信任案。^⑥

张佩纶称欲与李鸿章“内外并力”，以济时艰，然越事已如残棋，自己身膺总理衙门大臣职位，万一不慎，“怨家得以指摘非议，不为晁家令之诛，亦作李忠定之贬，使后人目为书生果不任事，则佩纶所遭之不幸”，可见张佩纶对自己的境遇有着清醒的认识——“书生果不任事”一语成谶，只是并非在总理衙门大臣的任上，而是在来年南下闽疆之时。对前线境况，张佩纶认为彭玉麟出师亦非善策，“高年触瘴，水师战陆，均非所宜”，但刘永福若坐守山西，来春法军反可水陆并攻，倒不如趁此时集合军队，以攻为守。^⑦

十一月十七日，法军攻占山西，刘永福退至兴化。^⑧远在京师的张佩纶

① 参见《致张佩纶（光绪九年十月十三日夜）》，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3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10~311页。

② 参见《张佩纶致李鸿章（光绪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姜鸣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18页。

③ 参见《张佩纶致李鸿章（光绪九年十一月初三日）》，姜鸣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19页。

④ 参见李宗侗、刘凤翰：《李鸿藻年谱》，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08页。

⑤ 参见《致张佩纶（光绪九年十一月初六日夜）》，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3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29页。

⑥ 参见刘忆江：《李鸿章年谱长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0页。

⑦ 参见《张佩纶致李鸿章（光绪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姜鸣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23~324页。

⑧ 参见李宗侗、刘凤翰：《李鸿藻年谱》，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08页。关于中法山西之役的详情，参见黄振南：《中法战争诸役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3~150页。

当日未得讯息，谓“法兵已攻山西，无大胜负”，欲援山西，须滇军得力，恐唐炯难当此任。张树声力请彭玉麟出关，张佩纶与李鸿章均不以为然，另外张树声每遇事必咨中央，而“当轴迟回不断”，同样令人忧心。此刻张佩纶方叹“晓山（徐延旭）似愚，而振公（张树声）似懦，经略北圻，殊难其人”。^①

十一月二十六日，张佩纶奉旨赴津，与李鸿章商议越事。^②两日后，李鸿章上一折一片，陈言越南形势。他认为目前应该“不以前一却定疆吏之功罪，不以一胜一败卜庙算之是非”；对山西之败不必太过介意，接下来应当向前线放权，“悉以委之岑毓英……不为遥制”，^③将黄桂兰、赵沃、刘永福等军均归其节制，扼守北宁；北洋须再向西南筹解军火，以求久持；未尽事宜由张佩纶回京后禀报。^④这两封折片是李、张两人在面议后取得共识的折中结果，李鸿章暂时转向主战，固然是外部形势所迫，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张佩纶向他传达了京师慈禧太后等人倾向于开战的态度，其真实想法恐怕也是以战促和，而非一意主战、一线到底，乃至盲目扩大战事，正所谓“谋画之始，断不可轻于言战；而败挫之后，又不宜轻于言和”。^⑤

四、“越事殆无可为”：北宁兵败后的连锁反应

光绪九年十二月初十日，李鸿章向张佩纶抱怨徐延旭太过天真，“晓山所请会攻河内一节，殊属梦呓”，此时固守北宁已属不易，遑论远攻河内。各国领事对张佩纶在任职总理衙门后的举措也很肯定，李鸿章称以后“交涉当易理论”，可见其依然在为弭兵议和做准备。^⑥张佩纶却对负责对外事务的总理衙门同僚极不满意，称署中“事事迁就，人人疲玩”。^⑦

光绪十年正月，张佩纶、李鸿章函商如何撤换徐延旭。因前敌事权涣

① 参见《张佩纶致李鸿章（光绪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姜鸣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27页。

② 参见刘忆江：《李鸿章年谱长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0页。

③ 参见《妥筹边计折（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10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31页。

④ 参见《妥筹前敌军事片（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10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32~333页。

⑤ 《妥筹边计折（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10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31页。

⑥ 参见《致张佩纶（光绪九年十二月初十日未时）》，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3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42页。

⑦ 参见张佩纶：《致李肃毅师相》，石向謩等点校：《涧于集》下册，燕山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822页。

散，此前李鸿章曾奏请将诸将均归岑毓英统一节制，但上谕迟迟未下，故张佩纶每见军机大臣李鸿藻都以此事相劝，李鸿藻“似有动意”。^①甲申年新春风雪颇大，电线皆断，电报难通，前线军情传递甚慢。李鸿章深恐新近出关的滇军、粤军难以及时接应北宁，法军援兵一到，北宁终难固守，他向张佩纶表示：徐延旭等人自一开始便倚重刘永福，乃其不知兵的表现；虽与徐延旭素昧平生，但从他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其好为大言，出关御敌断难成功；唐炯此前只参加过地方剿匪，军事经验不够，是以在山西战败后慌张失措；从茹费理与曾纪泽的谈判中推断，法国仅愿占据山西和北宁等城，似乎并非要与中国开战，但如果对方占据了北宁等地，此后大局将更加糜烂。^②

李鸿章的担心很快便应验了。二月十一日，法军开始大举进军，十五日攻占北宁。^③二月十八日，张佩纶得知消息，连夜向李鸿章问询对策：称徐延旭“太不知兵”，“欲去之久矣”，言虽如此，但徐延旭终归还是出自清流派的保荐；又称吴大澂“为乐道（恭亲王）所尼，而潘（潘鼎新）、刘（刘秉璋）两公又不满众望”；希望李鸿章可以举荐将才，挽救危局。^④

以后见之明来看，北宁兵败确实关系重大，引发了后来的政治地震。李鸿章喟叹“北宁既失，越事殆无可为”，表示接下来只能稳固边防，御敌国门之外。对张佩纶函中所言，李鸿章亦有批评，他曾多次言及徐延旭非治兵之人，惜乎张佩纶不听。张佩纶此刻犹希望以吴大澂为替手，李鸿章亦不赞成，认为吴大澂出镇西南声望不能服众，而潘鼎新久历战阵，虽非最合适的人选，但总好过徐延旭，若早令其镇边，时局不至于糜烂至此，好在清廷已遣潘鼎新南下。^⑤但噩耗接连传来，二月二十三日，法军又占太原，张佩纶怒称“草木皆兵，一败涂地，可为深耻”，希望潘鼎新在赴粤后可“扼守关内”，而岑毓英可保卫滇境。张又询李，是否要就误荐徐延旭自请严谴。在信函最后，张佩纶将希望寄托于“淮部甚殷”。^⑥

① 参见《张佩纶致李鸿章（光绪十年正月□日）》，姜鸣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44页。

② 参见《致张佩纶（光绪十年正月初九日夜）》，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3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56页。

③ 关于北宁之战的详细过程，参见黄振南：《中法战争管窥》，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298页；廖宗麟：《中法战争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301页。

④ 参见《张佩纶致李鸿章（光绪十年二月十八日）》，姜鸣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59页。

⑤ 参见《李鸿章致张佩纶（光绪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姜鸣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60页。

⑥ 参见《张佩纶致李鸿章（光绪十年二月二十八日）》，姜鸣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61页。

李鸿章认为张佩纶不必自劾，徐延旭固为能吏，但将军务大局轻相委任，“在执事为失言，在朝廷为失人，不独鄙人不谓然，天下皆不谓然也”。张佩纶作为言官，虽然荐人失误“向无严谴之例”，但“枢辅一意信任，则不可解……当轴漫不加察，由于不知兵又不小心也。仆与高阳（李鸿藻）及执事皆至交关切，不得不深痛惜之”。此外，李鸿章还坦言淮军已日渐衰落，纵然接下来可以支持危局，恐也难以反攻，^① 潘鼎新受任于败军之际，局势已极难扭转。^②

张佩纶在回信中称自己“论越事在河内未失之先，荐徐、唐即附于请设兵轮、水师疏内”，暗示若有水师、火器相辅，徐延旭亦可不败；又说自己乃“新进少年，力少任重”，事成绝不争功，事败绝不诿过，徐延旭、唐炯方因兵败被朝廷下令逮捕，若在此时上疏自劬，又会被认为是“畏祸沽名”，不如“一听他人指摘”，将失言失人的责任一力承担。^③ 张佩纶虽称自己绝不诿过，但愤懑之情仍溢于言表。很快，张佩纶预料的“他人指摘”就到来了，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这份指摘竟如飓风般席卷了包括李鸿藻在内的整个军机处。

就在张、李二人函牍往来讨论北宁善后之策时，一场因北宁战败而起的影响张佩纶个人命运乃至晚清数十年政局走向的剧变，也悄然拉开帷幕，这便是震惊朝野的甲申易枢。光绪十年三月初八日，盛昱上折弹劾张佩纶、李鸿藻以及恭亲王等军机大臣，罪名主要是北宁兵败、荐举非人，其原本不过是在张华奎的幕后指使下对张佩纶发难，不料却被慈禧太后反向利用，借机罢黜了全班军机大臣。^④ 三月十三日，在罢黜以恭亲王为首的全部军机大臣之后，内廷传来谕旨，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任军机大臣，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次日，慈禧太后又下懿旨，命军机处遇有紧要事务与醇亲王奕譞会同商办。^⑤ 作为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在易枢之后虽未入枢，却取代恭亲王成为军机处的实际掌控者，故时人多以为此次政潮是慈禧与醇亲王合谋发动的。

三月十五日，在天津闻知消息的李鸿章大惊失色，信中先是将新进一班

① 参见《致张佩纶（光绪十年三月初二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3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75页。

② 参见《致张佩纶（光绪十年三月初一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3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74页。

③ 参见《张佩纶致李鸿章（光绪十年三月初四日）》，姜鸣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65页。

④ 参见姜鸣：《邯郸一枕笑匆匆：“甲申易枢”与政局大变动》，《却将谈笑洗苍凉：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编》，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124~184页。

⑤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1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第61、63页。

军机贬为“乳臭陋儒”，对醇亲王的举措表示无法理解，可见李鸿章认为醇亲王参与策划了易枢；又谓明亡于甲申年，朝局经此大变，恐又“弄成明季世界……知公无意久留，鄙人亦欲拂衣而去”。^①李鸿章称要与张佩纶共退，实际上也在努力为自己和张佩纶寻找退路。恰好此时前海关税务司德璀琳来津，带来了法军舰长福禄诺的中法和谈方案，李鸿章遂抓住时机，以弭兵祸。他在制订方案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张佩纶，希望张佩纶可以来津帮助自己谈判，从而借机使其政治境遇转危为安。^②张佩纶断然拒绝，并在回函中留下了关于清流派与洋务派的著名论断，其函称：

兴献（醇亲王）诸事痛快，我公当能行其志；但制言路易，制法人难耳。尊意主和，一线到底……惜上年山西挫后，为鄙人参末议，忽有主战坚持之语，乃致费如许斡旋，所谓损友非耶……言路于尊书颇不平，然亦无害于事……作清流须清到底，犹公之谈洋务，各有门面也，一笑……至鄙人来津议和，断不遵命，宁死，断不附和和议。幸公勿为此言，才望亦不著也；能退为幸，志已决矣。^③

张佩纶所言包含三层意涵：在醇亲王的主持下，李鸿章可以避免言官参劾的干扰，但言路易挡，法人难制；李鸿章本来一意主和，但在山西之战后曾接受他的建议转而主战，此后经历诸多周折；清流派与李鸿章所属的洋务派，两脉“各有门面”，犹须坚持到底，身为清流派，他誓死不愿参与和议。^④

张佩纶不愿来津相助，李鸿章也只能独自施展“自全之术”。^⑤《李福协定》很快便于光绪十年四月十七日签订，但由于李鸿章急于求成，又为战火重开埋下伏笔，而张佩纶也因固执己见，最终折戟马尾，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⑥

① 参见《致张佩纶（光绪十年三月十五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3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77页。

② 参见张晓川：《张佩纶致李鸿章密札隐语笺释》，《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1期，第124页；《致张佩纶（光绪十年三月二十七日夜）》，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3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83页。

③ 《张佩纶致李鸿章（光绪十年四月初八日）》，姜鸣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82页。

④ 关于清流、洋务两脉“各有门面”的论述，参见陆胤：《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0～51页；戴海斌：《清流、洋务“各有门面”？——以李鸿章与张之洞早期交往为线索》，《史林》2021年第1期，第126～128页。

⑤ 《致张佩纶（光绪十年三月二十七日夜三鼓）》，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3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83页。

⑥ 关于甲申易枢后张佩纶与李鸿章的往来函商，参见张晓川：《张佩纶致李鸿章密札隐语笺释》，《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1期，第117～125页。

五、结语

史家陈寅恪在追述先世时曾云：“自同治至光绪末年，京官以恭亲王奕訢李鸿藻陈宝琛张佩纶等，外官以沈葆楨张之洞等为清流。京官以醇亲王奕譞孙毓汶等，外官以李鸿章张树声等为浊流。”^①若依此而论，则张、李二人分属“清流”与“浊流”。然而，所谓清浊绝非泾渭分明，其间不乏勾兑与协商。王维江便曾指出：“多少年来，‘清流’主战，李鸿章主和，似已成历史定论。而中法危机中各方言论证明，事情远不是这么简单。”^②

笔者通过梳理甲申易枢前李鸿章与张佩纶关于越南问题的商议，揭示了分属洋务、清流两脉的二人在对外策略上的异同。一开始张佩纶对越事的认知源自李鸿章，但很快两人观点便有了歧异：张主战，李主和。此种歧异缘于两者角色不同，立场各异：一为谏官，一为疆臣；一重令名，一重实务。

李鸿章与张佩纶的矛盾一度在光绪九年五月、六月间达到顶峰，但李鸿章随即做出退让。此后二者关系一如既往，遇事彼此共商。有论者曾指出，李、张二人每逢观点龃龉时，都留出空间，不给对方造成伤害，过后依然关系如常，“张佩纶绝不找茬弹劾李鸿章，这是张—李关系中极为微妙的部分……两人关系，包含着信任欣赏、也包含着各自独立的政治判断和对立”。^③

李鸿章与张佩纶的对立还集中体现在对前线将领的评价上，张佩纶一意举荐徐延旭，李鸿章从一开始便不以为然，事实证明此事确实成为张的最大疏漏。当然，李、张也不乏共谋。例如，光绪九年初张佩纶以徐延旭出关相佐李鸿章言和；同年十一月李鸿章在张佩纶去津后积极支持战备。总体而言，李鸿章与张佩纶在甲申易枢前关于越南问题的意见分歧，基本也映射了其最终的命运归宿。李鸿章对外和戎，尽管屡次促和弭兵，但议约貽患，生前备受非议，身后倾颓不已；张佩纶虽有意力战，却终因书生典兵而清名陨落。

（责任编辑：张梦晗）

① 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91页。

② 王维江：《张佩纶：悲情“清流”》，《史林》2008年第5期，第8页。

③ 姜鸣：《李鸿章“夺情”复出与“清流”的幕后筹划——张佩纶李鸿章通信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22页。